

试论马克思早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

梅荣政 刘德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作了全面的论述。1845年以前,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35年——1843年春,是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时期;1843年夏——1845年春,是转向唯物史观的时期。这两个阶段虽然都具有过渡的性质,但是既有质的不同,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前一时期是后一时期的必要准备,后一时期是前一时期合理因素发展的必然归宿。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的历史唯心主义,论述较多,而对于他这个时期历史观中的合理的理论因素及其特点,系统发掘和研究不够。这种情况实际上把前后两个阶段割裂开了,很难从内部联系上说明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有机过程。为克服这一缺陷,具体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这一时期历史观的特点,本文试图对1843年春以前蕴藏于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特点作些初步探讨,恳求得到指教。

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1843年春以前,马克思的历史观从总体上说唯心主义的,但是其中包含不少为后来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基础的合理因素。这些因素构成马克思早期历史观中的革命现实主义。如果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那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这种革命现实主义,就自然会感到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征兆。

马克思青年时期,在思想上一度产生这种独特的社会历史观点,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同黑格尔庞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间的尖锐矛盾的一种反映,不能不带有某种时代的特点。我们知道,19世纪的30—40年代,德国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不断加深,社会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各个阶级的思想代表,按各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提出了整治社会的种种药方。在当时诸思想派别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德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代表黑格尔哲学体系,它有极其宏伟的历史观。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黑格尔没有从他的辩证法原则本身,而是从建立他的哲学体系时的社会环境作出了保守的政治结论,因而他未能对社会矛盾提出的现实任务,作出科学的解释。继后的青年黑格尔派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的论点,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在自我意识哲学的支配下,把革命限制在理论变革的范围内。这种社会历史特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一方面客观上要求

^{*} 本文所说的马克思早期历史观限于1835—1843年春。

人们透过各种思想体系，特别是作为当时“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②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去重新探索真实的历史过程，科学地解释德国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矛盾，找出改造德国社会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庞大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仍然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直接强烈地影响着包括青年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人，使之不能在短期内根本摆脱黑格尔观念的束缚。青年马克思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开始自己的理论与革命实践活动的。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从彻底变革社会现实的强烈热望出发，力图抓住社会历史的真实，探索改造现实社会的客观规律。但是这种探索又没有根本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因此，这就不能不在青年马克思早期理论创作活动中产生矛盾：力图反映社会历史真实同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深刻影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1843年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就是他思想上已经产生但又尚未充分发展的上述矛盾的理论反映。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以前，以客观现实主义态度去认识和理解社会历史的观点。这种观点若明若暗地存在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外壳之中，而又表现出独特的内容。

列宁说：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③。为弄清马克思早期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我们对它的发展作些粗略的历史考察。

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的初步确立

马克思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最初表露在他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1835年）中，他在那里提出了关于客观社会现实决定人们寻求职业的主观臆念的独特见解^④。在大学时代，马克思研究黑格尔哲学，照其客观性、辩证性和能动性原则，着力去观察社会历史和现实，确定哲学要反映现实社会内部所固有的、作为社会历史“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滋长着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构成他历史观上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同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解释的矛盾。

1841年马克思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一次以一种哲学形态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四十年代初的德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已经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青年马克思，苦苦思索着：怎样消除社会灾难，使人摆脱专制压迫？哲学同生活如何联系起来？在思考和探索中，他广泛地钻研哲学史，从中发现伊壁鸠鲁等哲学体系同希腊生活的关联，认为伊壁鸠鲁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已经以素朴的形式初步提出了近代卓越思想家们力求解决的根本性的政治和哲学问题。于是，他企图通过对古希腊早期哲学思想的批判认识来为分析现代的社会关系找出理论根据。这一根本出发点决定了《博士论文》中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

第一，把积极干预和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规定为哲学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从哲学和历史发展的关系上探讨了哲学的本质。他根据黑格尔关于精神和具体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原则，提出哲学精神的发展是通过与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这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过程：当世界合理发展时，精神就和世界协调一致；当世界变得不合理时，精神就从世界分离出来，作为意志同它对立，以便扬弃自己，在世界哲学化的过程中，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哲学和世界的辩证过程。这里，虽然精神是绝对创造活动的力量，但是，世界历史内部的辩证矛盾却是发展的动力。这个区别于黑格尔，也区别于鲍威尔的崭新哲学见解，为哲学积极干预和改变现存社会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普鲁士，正是哲学和变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处于分裂、矛盾

的时期。马克思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愤懑早在他的政治诗里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在这里，马克思论证了哲学精神有规律地向革命实践过渡的原则。指出改造不合理的世界，建立新生活，是哲学生活途径之最集中的表现，是哲学的根本目标，“正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从土地上盖屋安家一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就起来反对现存世界。”^⑥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原子偏离直线运动学说的价值，在于论证了个人意识在无能为力和受压迫的世界中，如何不受外部命运的支配，而确立自由。但是，伊壁鸠鲁把个人意识同世界对立起来，使精神不能作用于周围环境，这种绝对自由不可能是现实的。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纯思想的王国”的说教，也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哲学”的局限性。

第二，把攻击神灵信仰作为同现存社会制度作斗争的重要方面。

在当时的普鲁士基督教国家中，宗教统治就是“政府意志的崇拜”。对宗教的批判是反映反对派政治观点的主要表现形式。对马克思来说，是他强烈要求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侧面。马克思在论文的附录中，通过论述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的政治批判，捍卫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驳斥了普卢塔克关于神灵信仰的论证，并利用谢林早期著作中所持的反宗教的论点驳斥了他晚年的反动神学世界观。谢林是在1841年2月被普鲁士国家聘请到柏林来宣传反动的浪漫主义，讨伐革命民主主义的，所以马克思抨击年老的谢林本身，就具有尖锐的性质。不仅如此，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的格言公开宣布：“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⑦，“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⑧所谓“地下的神灵”，无疑是指当时德国的反动暴政和压迫制度。马克思还指出：“一定的国家对于异国的特定神灵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神灵来说一样，就是这个神灵停止其存在的地方。”^⑨“上帝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于本质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的证明，自我意识的逻辑说明。”^⑩这些论点是马克思同当时反动的邪恶势力展开斗争的重要反映，在世界观上接近了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观点。

第三，对黑格尔哲学的疑义和初步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马克思独特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初步确立的标志。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按其观点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⑪因为马克思当时还把世界历史的发展视为精神的自由进步。但是，这时的马克思，绝不是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黑格尔哲学的绝对崇拜者。”^⑫事实是，在这篇学位论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提出了疑义和作出了初步批判。他指出，黑格尔出自“主要叫做思辩的观点”^⑬，不能正确认识伊壁鸠鲁等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一般希腊精神的重要意义”^⑭；黑格尔政治上的保守结论的“内在根源在于对他的原则本身的不充分或没有充分掌握。”^⑮即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黑格尔关于“上帝或绝对者存在”的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语反复。”^⑯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许多独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见解，受到了当时哲学界的极大推崇，因此，这篇论文于1841年4月在耶拿大学以通信方式顺利地完成了答辩。它标志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也就初步地确立起来。

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从1842年初，特别是参加《莱茵报》写稿、任主编以后，把理论研究和政治斗争直

接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

第一，批判普鲁士专制，争取民主自由。

在当时的普鲁士，出版自由问题是社会民主势力同封建专制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国王威廉四世的新的书报检查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怎样对待这个检查令，是对人们政治立场和社会见解的检验。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在《法哲学》§319中的结论是保守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布尔等人也抱着自由主义的幻想。相反，马克思既不从黑格尔的既定结论出发，也不醉心于虚妄的梦幻，他以独特的现实主义态度对新指令作了冷静的分析，并第一次以革命政论家的辉煌论辩才能发表了政治评论。他指出，威廉四世的新指令不是什么“恩泽”，而是专制政治的欺骗，实质在加强镇压人民的精神自由。因此，要坚决“废除书报检查制度。”^⑩马克思这一结论，暗示出对整个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

进而，马克思直接批判了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吹捧“君主政体是国家的最高形式。”^⑪马克思却认为君主专制是以宗教为法衣的被颠倒了的社会现实，“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已经成了政府的信仰和政府的原则”^⑫，因而批判它是第一位的任务。马克思痛斥了自由主义派宣扬的君主立宪制思想。184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说，他要写一篇文章批判黑格尔的法的和政治的概念，“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彻底自相矛盾和自相毁灭的这种混合物作斗争。”^⑬

马克思历史观中，人民占有中心地位，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是二位一体的。所以在否定君主专制以后，马克思提出了人民政府的思想。断言没有人民政府，就没有自由的政治生活，代表权应当是人民的自我代表权。

第二，对社会各等级的初步分析。

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把出版自由同不同等级对待该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开始认识到不同等级的不同观点是由不同的等级利益所决定的，从而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建立在更为具体的现实基础上。他指出：出版辩论是一场等级论战。诸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各等级的代表，各受其所代表的利益的制约，政治立场各不相同：诸侯、贵族代表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资产者反对派”不同于“市民反对派”的意见；受压迫的农民代表能说出“真正的历史观点”。基于这种具体的独立分析，马克思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立场出发，热烈赞同农民代表的“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⑭。

马克思在作等级分析时，还表述了两个很重要的思想。一是要求对待社会问题不要流于清谈，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关系出发。他认为市民代表以企业经营自由的名义要求出版自由的方式，“比德国自由派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词、模稜两可的议论来得高明。”^⑮二是马克思同意农民代表的一个论点，即在时间的推移中，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调整必然会产生新的要求、新的社会状态。在稍后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又从人类史的发展上写道：“世界史上不自由的时期要求表现这一不自由的法。”^⑯这些观点是社会关系产生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萌芽，表明马克思对社会中的思想、政治、物质诸方面的真实关系的认识，尽管还是以黑格尔主义为前提的，但是具有了较多的合理成分。

第三，接近发现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

1842年秋至1843年夏，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政治斗争的扩展，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信念更加动摇了，他开始注意将自己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进行改造和提高，向着建立新的唯物史观的目标前进。因而，马克思历史观中唯物主义的倾向有了明

显的增长。这里试分析几例：

例如，马克思通过分析议会确定的“盗窃林木”概念和建立的惩罚标准，发现了私人利益对国家制度和职能的制约作用。他批判地写道，“把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代表的这种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论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④这段话虽然是就林木占有者和国家机关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而说的，但它表明，马克思在“现实生活的戏”里发现，现实的国家不是什么“存在于地上的神性理念”^⑤，而是林木占有者即统治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决定着国家机构及其活动内容。这些论点，自然还未能彻底克服掉黑格尔哲学原则和对现实的客观解释之间的矛盾，所借用的还是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某些概念和术语。但是，对于马克思历史观来说，最紧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一般国家的抽象概念上，而是努力去探索国家的制度、职能、现行政策同私人利益的联系，这就为最后突破黑格尔哲学体系准备了基础。就政治目的来说，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主义的铠甲，是为了同现存的普鲁士反动国家进行战斗。如他说，“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⑥，这无宁说，普鲁士国家“按私有制的性质而不按自己本身的性质来行动”^⑦，降低了一般国家的水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应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再如，马克思揭露了在对抗性的私有财产关系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在广义的封建制度下，即资产阶级社会里，私有财产关系表现出来的不是自由主义者设想的什么普遍福利，而是人类世界的分裂：“雄蜂杀死工蜂——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⑧就是说，社会中的劳动阶级同寄生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要消除这种对立，就要用“人类世界”来取代“被分裂的人类世界”。这些论点，表明马克思开始超越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而接近无产阶级立场了。

又如，马克思关于“要求出版自由的必然性是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⑨证明。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根据故乡的生活条件，应“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⑩，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⑪展开了锋锐的论证。马克思指出：国家某一地区的经常的贫困状况揭示出社会现实和国家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关系以及管理机构和被管理机构之间的官僚关系”^⑫的势力，农民的利益和权力受到轻蔑，“世界的真实景象”被歪曲成“官僚在办公室里所构成的世界景象”^⑬。“官僚的现实”掩盖了农民贫困的“真正的现实”。结果，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被归之为治理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之内，或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过失，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事实上，农民的贫困状况，并不是治理之外的原因，也不能用个别官吏的意志、感情来解释，因为“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⑭的，是一些客观关系，这就是普鲁士国家官僚化的本质关系。马克思通过援引特利尔农民要求减轻税负的请愿书上的数据——“以前这个地方有 27 个官员，其薪金共为 29000 塔勒，现在则有 63 个官员，其薪金共为 105,000 塔勒，其中还不包括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官员”^⑮——从事实上表明日益庞大的普鲁士官僚国家，管理原则同现实冲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深。普鲁士官僚国家及其同劳动人民对立的深刻经济根源，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为了引起祖国对农民贫困状况的普遍注意和普遍同情，

批评官方的管理原则，减轻农民的贫困状况，就产生了摩塞河沿岸地区农民对自由报刊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这一论证，就在事实上说明了政治因素是由经济的物质利益的要求而产生的。关于这种经济有重大作用的见解，在马克思稍后写给《莱茵报》的《论科伦省议会的选举》一文中，表述得更加清晰。在那里，马克思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开始懂得“政治斗争是社会经济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②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③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其用经济关系来说明社会关系的结果，最终解决了头脑中的唯心主义哲学原则与对现实的客观解释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历史观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便升华为唯物主义的现实观。

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特点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早期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的特点：

首先，这种历史观点以认识和变革社会现实为其根本出发点。青年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现实有浓厚兴趣，因而立志找到科学解释现实的钥匙，把哲学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成了他早期理论活动的轴心。他把实际政治活动同黑格尔关于历史辩证运动的原理结合起来，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认为，不能“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④去对待社会历史和现实，只有现实才是理论的立足点。所以他十分厌恶那种迷醉于脱离实际的空谈习气，坚决要求着力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些具体的现实”^⑤。马克思这种力图批判地认识现实社会关系、深刻地反映周围世界、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想，使他思想解放，能够批判地思考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并勇敢地着力地去敲打黑格尔哲学体系封闭着的大门，让哲学走向现实生活，真正成为革命的斗争武器。

其次，这种社会历史观，直接承认社会历史的客观性。马克思说，如果“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就会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时走入歧途^⑥。他十分强调社会客观关系的作用，这虽然还不能说是一种成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因为他还没有提出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里已经肯定了社会关系及其客观性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前提。正因为马克思这时还不能做到以成熟的唯物史观来理解社会历史和现实，因而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具有一种明显的直观性，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往往还是停留在表象上，还不能完全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和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但这些情形表明马克思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向唯物史观过渡的明显倾向。

其三，这种历史观点，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以黑格尔哲学形式表述其现实主义内容的，因而，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当马克思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分析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经济生活，自发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因素像只悄悄地前进的田鼠在历史观中逐渐增长起来的时候，他暂时还不能从本质上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新因素，而只能常常用黑格尔哲学方式，来表述自己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主义见解，由此带来马克思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的复杂性。因此，在揭露现实时，马克思的观点具有鲜明的战斗精神，具体的真实内容，而作理论概括时又把问题自觉不自觉地归结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上。过去有些研究者对于这种复杂性具体分析不够，把马克思现实主义的合理因素也一概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加以评述，这是不符

合实际的。其实，马克思这一时期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中某些合理内核初步改造的表现，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外壳掩盖下的真正现实生活的理论反映。

其四，这种历史观，是马克思彻底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的理论反映。马克思的革命现实主义是由马克思彻底的劳苦大众的立场决定的。在《莱茵报》工作后期，马克思相信劳苦大众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代表劳动人民的立场愈来愈明确。他把是否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判断现实生活的是非。马克思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观点，当然就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理论反映，因而也就决定了这种历史观点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过渡的必然性。当时德国的现实，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尽管马克思把德国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斥为“下流唯物主义”^④，但他已经开始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探索革命现实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途径。

我们强调发掘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前的历史观中的革命现实主义，决不是要说明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独立的历史观，而是想找出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史观的基本联结点。马克思早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观点，是马克思从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理论形态，与唯物史观有原则区别。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客观唯心主义的视野，但还没有脱离它的羁绊。因为这时马克思在哲学上并没有完成对黑格尔的精神和物质关系的颠倒，也没有认识到物质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根源，未能揭示出社会经济形态运动的规律性，更没有构成新的成熟的哲学体系。但就其所包含的那些合理因素讲，它与唯物史观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因为这种把社会关系作为客观实在，立足于变革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它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增长着素朴的唯物主义倾向，为后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必要的准备。当他从社会舞台暂时退回书房，认真研究和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合理成分，彻底批判了黑格尔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唯心主义观点，探索社会过程的真正动力、革命改变现存制度的道路和形式时，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这种革命现实主义，也就必然被改造、熔融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之中了。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195、243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马克思：《博士论文》，第2、3、94、94、2、2、64、93页。

⑯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6页。

⑰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第326页。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93、83—84、142、160、184、155、143、216、210、210、229—230、224、216、240、216、180页。

㉞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433、436页。

㊱㊲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43、79页。

㊳ 柯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425页。

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